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何永远年轻

冯颜利 苏方永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以“三个充分”，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实践形成的理论特质与实践伟力，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如何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时隔数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余年党史的全新实践图景，再次作出“三个充分”重要论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这并非简单的理论复述，而是立足105年接续奋斗的全新实践图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作出再印证、再升华、再阐释，贯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为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根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成绩单”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立足实践、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真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史，既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造福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史，也是一部结合中国国情、人民需求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史。波澜壮阔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蕴藏于“三个充分”所概括的三重核心属性之中。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宏大试验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答了人类社会走向、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人类解放实现路径等一系列时代课题，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推翻

三座大山，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国家发展根本基业，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变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百余年发展成就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属性，彰显了其穿透历史、引领未来的强大真理力量。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底色，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和实践本色，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实际谋划事业、推动发展。革命岁月为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建设年代为国家自立艰苦奋斗，改革时期为民生改善开拓进取，新时代为民族复兴砥砺前行。105年的接续奋斗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始终与人民同行、与实践同步，依靠人民实践创造历史伟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真理价值、人民利益、实践成效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具备自我革新、兼容并蓄的开放基因，是随时代发展、实践深化、文明进步持续迭代升级的动态理论体系。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筑牢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科学指引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质。

真理管不管用？百年中国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百余年党史生动诠释了“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唯物辩证法逻辑。

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初心使命、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时代大局，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实践滋养理论、以理论引领实践，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这既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

坚守实践为本。始终以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束之高阁的书本理论，而是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行动指南，其生命力和真理力量体现在实践成效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在探索实践中总结规律、提炼理论。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直面发展中的矛盾难题，在破解实践困境、总结实践经验中推进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始终扎根中国实践沃土，展现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大的实践指导性。

坚持自觉创新。我们党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源于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独立自主的探索担当。一方面，我们党始终保持理论自觉，深刻洞悉时代发展、实践深化、人民需求的动态变化，主动依托新实践、解答新课题、发展新理论，以理论突破引领事业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坚决摒弃照搬照抄的教条思维和照搬他国模式的错误路径，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路。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迈向新高度。

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新境界。

深耕“第一个结合”：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推动理论守正创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根基，核心要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课题、解决实际问题。新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牢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决摒弃教条思维、固化认知。立足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在总结实践经验、破解发展难题、应对风险挑战中提炼规律性认识，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同频共进、协同发展。

夯实“第二个结合”：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马克思主义文化根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深厚文明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价值理念、辩证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等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实现了科学真理与中华文脉的完美交融。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生命力，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滋养党的创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充分”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余年实践的辉煌成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何永远年轻的深层逻辑。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三个充分”蕴含的理论深意，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脉络，自觉以“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守正创新，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与时代价值。

（作者分别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掌握正确政绩观的『辩证法』

王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这五大辩证关系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构成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

稳和进二者辩证统一。所谓“稳”，就是守住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大局安定、风险隐患可控以及民生保障有力的基本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工作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所谓“进”，就是强化担当精神，敢于突破思维定势、破解发展难题，主动开拓进取；就是不满足于原地踏步，立足当下谋划长远，在改革创新、服务提升和治理优化等方面主动争先、力求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稳是安全之底线，进是发展之要求；稳是进的前提和基础，进是稳的保障和条件；稳离不开进的支撑，进离不开稳的保障。

稳需要坚决摒弃盲目冒进、急于求成和大干快上的浮躁心态，同时，稳定不等于停滞，守底线不等于因循守旧，奋进新时代新征程需要主动求进、积极作为，才能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和拓展发展空间。稳和进的良性互动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守的重要原则，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的基础打扎实、把进的步伐迈稳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处理好立和破的关系

立与破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事物的发展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由立到破再到立的过程。所谓“破”，就是坚决破除束缚高质量发展的思维定势，坚决打破阻碍发展与脱离实际的老套路，敢于直面矛盾、刀刃向内革除积弊，为事业发展扫清障碍、腾出空间。所谓“立”，就是坚持新发展理念，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科学高效的工作体系，精准有力的落实举措。

破旧立新、立破并举，是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思维方式。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思想破冰和机制破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先立后破，杜绝只破不立的盲目折腾和只立不破的守旧不前，要建立系统的长效机制，以破旧释放活力、以立新夯实根基，持续推动发展质量、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处理好虚和实的关系

虚实之间，映照工作作风，检验政绩成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关键。重“虚”功的本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具体表现为重痕迹轻实效、重表态轻落实和重声势轻质量，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工程和造短期亮眼数据，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贻误发展时机，是经不起推敲的虚浮政绩。重“实”绩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察实情、谋实策、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立足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推进工作。

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真抓实干是干事创业的立身之本，政绩唯有求真务实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务实笃行作为工作准则，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功夫下在解难题中，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和惠民生的实事，坚决不做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虚功，以实打实的担当创造实打实的政绩。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

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是提升治理效能、化解突出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所谓“标”，是指摆在眼前、群众直观感受和影响当下的突出问题和显性矛盾，具有紧迫性、直观性，要求迅速响应、及时处置，回应群众诉求并稳住工作局面。所谓“本”，是催生问题反复发生的制度漏洞、机制短板，具有根源性、基础性和长期性，必须深挖症结、靶向施策和系统治理。

各类发展问题、治理难题和民生短板，既有显性的表象，更有深层的根源，只重表象整改、忽视根源治理，只会不断反复、劳而无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思维，杜绝重整改、轻根治，重短效、轻长效的片面做法。坚持治标不松懈、治本不停步，以精准治标化解当下突出问题，以深度治本补齐制度短板、完善治理体系，实现短期整治见效、长期固本收效，推动各项治理工作常态长效、提质增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处理好近和远的关系

远近兼顾、长短结合，是共产党人胸怀大局、着眼长远的格局境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所谓“近”，就是立足当下岗位职责，抓实阶段性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解决群众近期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以赴抓好当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确保件件有成效、事事有回音，切实稳住当前发展基本盘。所谓“远”，就是胸怀“国之大者”，立足区域发展大局和长远战略，多做打基础、固根本、惠后人的战略性工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坚决克服重当下出彩、轻长远积淀的功利心态；既要立足当下抓落实，更要着眼长远谋全局，唯有统筹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才能推动事业持续发展。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和踔厉奋发的实干，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

（作者为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三级教授）

青马在线

不看“洋外衣”，看的是“中国心”

王宠

漫步商圈，常见这样的景象：美妆集合店里，法文招牌在射灯下熠熠生辉，中文店名小到凑近了才看得清；奶茶店杯身印满日文假名，产地却是实打实的中国。打开电商平台，国产护肤品的研发故事绕开中国，径直指向某个语焉不详的“欧洲实验室”。

这样的场景见多了，很容易得出一个笼统印象：国产品牌都在崇洋媚外。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同一家商场里，既有刻意隐藏中国身份的“伪洋牌”，也有靠过硬产品建立口碑、至今仍用着创业初期英文名的老牌国货，还有大大方方用汉字命名、照样受年轻人追捧的新消费品牌。问题远比“崇洋媚外”四个字复杂。真正需要的，是从“取洋名”看清楚里面装着不同的动机、处境和心态。

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有一个精妙论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的形式往往遮蔽其实质。当品牌名称与产

品的产地、工艺、文化根基发生错位时，我们需要追问——这种错位，到底是处心积虑的欺骗，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还是理性权衡后的功能性选择？

第一类：以“洋”为贵的身份投机。

部分品牌取洋名，并非为了走向国际市场，而是瞄准国内部分消费者心中残存的进口崇拜——注册海外公司、包装全篇外文、宣传暗示源自巴黎，甚至公然虚构原装进口。这是借助信息不对称套取溢价的市场投机，是形式对实质的恶意遮蔽。它不仅破坏市场秩序，更持续再生产“中国制造不如外国”的偏见，冲击国货来之不易的文化认同根基。

第二类：特定历史阶段的“入场券”。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是廉价品的代名词，国内消费者对国货的信任度也有限。不少服装、家电品牌取一个洋气的名字，并非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仰慕，更像是一张打入市场的入场券——先让产品被看见，再慢

慢积攒口碑。这类品牌大多没有刻意隐瞒中国出身，当市场成熟、消费者心态变化后，它们中的许多也顺势调整策略，重新讲起了中国故事。它们身上的“洋装”，是形式与实质在特定阶段不得不承受的错位。

第三类：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工具。

当一家企业的目标市场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择一个易于发音、拼写、记忆且不产生文化歧义的品牌名称，是最正常不过的商业考量。华为的“HUAWEI”保持全球一致的拼写，大疆的“DJI”是英文缩写，“TikTok”本身就是一个全新造词。它们的共同点是：名字首先是服务于全球传播效率的功能性工具，与文化认同没有直接对立关系。这些品牌在技术、产品、价值主张上，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没有人会怀疑大疆不是一家中国公司，因为它的实力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身份标识。

如果说“取洋名”现象中确有文化不

自信的成分，根源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序列——“西方即现代、西方即高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经由时尚媒介、影视作品、商业广告的持续渗透，“西式审美等于高级感”被内化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于是，一面是本土品牌拼命披“洋外衣”，另一面却是真正的国际品牌进入中国时极力寻求本土化命名——可口可乐、宝洁、宜家，精心挑选的中文译名甚至比原名更富美好寓意。

文化不自信的真正表现，不是使用外文，而是使用外文时对自己来路的遮掩、那种不敢坦然说“我是中国品牌”的心虚。反过来，文化自信的真正标志，也不是是否使用汉字，而是无论用什么语言，都能坦然地站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既不刻意迎合西方的审美标准，也不简单排斥外来的表达方式。

（作者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让科技金融不断激活武汉新质生产力

胡征 余翔

科技是国之重器，金融是国之血脉。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五篇大文章”，将科技金融摆在首位，明确了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战略方向。当前，武汉正锚定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标。武汉拥有密集的高校院所集群和国家级科研体系，科技资源禀赋居全国前列。然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优质项目本地留存率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何破除科技与金融之间的体制壁垒与信息不对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线的金融通道，使科技金融真正成为武汉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是当下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科技是光，金融是导体：科技金融如何重塑创新逻辑

科技金融不是科技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其本质是重塑金融要素的分配机制，实现资金链与创新链的“无缝对接”。

从生产力演进规律看，科技突破具有知识密集、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传统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模式，天然倾向于重

资产、低风险的成熟期企业，难以匹配科技创新型企业在种子期、初创期的融资需求。科技金融则改变了这一局面。

一方面，科技金融发挥“风险分担器”作用。通过创业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以及投贷联动等多元化工具，将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耐心资本，天使资金，合理分担科技创新的高失败风险。另一方面，科技金融具有“价值发现器”功能。专业化的科技金融机构不仅评估企业财务状况，更能洞察核心技术、专利价值及产业前景，从而实现对轻资产、无抵押科创企业的信用建构。对武汉而言，丰富的科教资源只有借助科技金融这一“催化剂”，才能实现“技术—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跨越“死亡之谷”，让实验室的成果“活”在生产线

武汉在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领域拥有雄厚国家级科研力量。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留存率与科研资源体量仍不相称。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供给在“死亡之谷”阶段的系统性缺位——风险资本不敢投早、银行信贷难

以评估、保险保障几近空白。

打通这一堵点需要三管齐下。首先，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这要求进一步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考核导向，建立与投资周期相匹配的容错免责机制，允许以项目组合整体收益评价绩效，从制度上解除国有资本的后顾之忧。

其次，推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重智力”特点，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等业务，让“技术专利”转化为可抵押贷款的“硬通货”。同时，积极探索“科技研发准备金保险”“科创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等新型险种，为基础研究撑起“保护伞”。

再次，构建科创企业专属信用评级体系。由市金融局牵头整合市场监管、税务、专利等多部门数据，搭建“科创企业大数据信用平台”，以专利成果、研发投入、人才结构等科技维度指标替代传统抵押资产评估。

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

科技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绝非金融机构“单兵作战”所能及，而需要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科技中介等多